

国际问题研究

国际与地区格局演进中的巴以问题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上海 200083)

摘要：从国际和地区格局历史演进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巴以问题可分为五个阶段,即一战至二战期间巴以问题形成(1914~1948)、冷战前期四次中东战争与阿以冲突发展变化(1948~1979)、冷战中后期国际和中东地区格局剧烈变动与巴以问题复杂化(1979~1990)、冷战后中东和平进程的进展及其受挫(1990~2001)、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和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2001~2023)。巴以问题作为国际社会持续时间最长、矛盾最为复杂、最难以解决的地区冲突,其原因就在于这一问题不仅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及双方各自内部矛盾的产物,而且还与殖民主义历史遗产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外部干涉密切相关,也与不同历史时期中东地区格局特别是地区大国之间的矛盾存在复杂关系。2023年10月以来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是国际格局、地区格局和巴以双方矛盾演化的产物,其爆发方式、伤亡规模、危机程度均打破了以往模式,对巴以双方、地区形势乃至国际体系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巴勒斯坦;以色列;国际格局;巴以冲突;地区格局;中东和平;两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24)01-0100-11

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持续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其根源在于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以来长期累积的复杂矛盾。自2000年以色列总理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美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无所作为,以色列与 Hamas(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三者之间矛盾日趋复杂,都使巴以和谈陷入困局,而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则进一步导致巴以问题在中东事务中日趋边缘化。

众所周知,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是巴以和谈的基础所在,亦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拥有完全主

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残酷的现实在于,新世纪以来巴以关系已陷入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怪圈。从2007年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分裂,且二者分别统治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以来,巴以冲突主要表现为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的冲突。2008年以来的数次加沙战事都遵循了相同的逻辑:以色列在修建犹太定居点问题(核心是领土问题)、耶路撒冷等问题上的激进行为,为哈马斯做出激进反应提供口实;以色列对哈马斯进行报复性打击,使巴以和谈的环境荡然无存;而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对巴以和谈基础的颠覆性破坏,更使巴以和谈的国际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收稿日期:2023-12-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国际体系与中东地区互动关系研究”(221JD810023)、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当代中东国家对外关系史研究”(2023)

作者简介: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正是由于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边缘化、美国片面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做法,导致2023年10月7日爆发了新一轮巴以冲突。此次冲突在爆发方式、伤亡规模、危机程度等方面均打破以往模式,使国际社会在如何促使巴以双方停止暴力、结束冲突、重启和平进程方面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①,并对巴以双方、地区形势乃至国际体系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②。

持续一个多世纪之久的巴以问题是国际社会持续时间最长、矛盾最为复杂、最难以解决的国际热点问题,究其原因,这一问题不仅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及双方各自内部矛盾的产物,而且还与殖民主义历史遗产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外部干涉密切相关,也与地区格局特别是地区大国之间的矛盾存在复杂关系。因此,如果把巴以问题放到一战以来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观察可以发现,这一问题是近代以来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演变的产物,而每次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都导致了巴以问题的复杂化。本文把巴以问题置于国际和地区格局的历史演进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分一战至二战期间巴以问题形成(1914~1948)、冷战前期四次中东战争与阿以冲突的发展变化(1948~1979)、冷战中后期国际和中东地区格局剧烈变动与巴以问题复杂化(1979~1990)、冷战后中东和平进程的进展及其受挫(1990~2001)、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和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2001~2023)五个阶段,从历史视角认识巴以问题的复杂性,进而了解巴以问题演变的历史经纬和复杂成因。

一、一战至二战结束后(1914~1948):巴勒斯坦问题的形成

从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西方列强对中东展

开了激烈的争夺。在中东的西部,即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也称肥沃的新月地带,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主要是英法争夺并分割黎凡特和阿拉伯半岛边缘地带;在东部则是英国和俄罗斯共同争夺伊朗。回顾这段历史,西方列强围绕黎凡特地区的种种肮脏交易,是导致巴勒斯坦问题不断复杂化的根源,英国殖民主义分而治之政策的历史遗产与美国主导联合国通过的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案,直接导致了延续至今的阿以冲突和巴以冲突。

(一)英国和法国对黎凡特地区的分割,尤其是英国对包括巴勒斯坦地区在内的黎凡特地区的矛盾安排和对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承诺的背信弃义,是导致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方面,英国通过“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Husayn-McMahon correspondence, 1915年7月-1916年3月),承诺战后在埃及以东的黎凡特地区和阿拉伯半岛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具体区域存在争议),以换取侯赛因领导阿拉伯人举行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对抗与英国的敌人德国结盟的奥斯曼帝国^③。另一方面,1916年英法之间签订塞克斯—皮科协定,对新月地带进行瓜分,这是一战中“最具争议的文件之一”,因为“它违反了英国对谢里夫侯赛因的部分承诺”^④;一战后,根据1920年《圣雷莫协定》,英国对伊拉克、约旦和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实行委任统治^⑤。与此同时,英国又于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内建立一个民族之家”^⑥,并据此支持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向巴勒斯坦移民,巴勒斯坦问题开始产生。由此可见,英国对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黎凡特地区做出三种矛盾安排,不仅直接导致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形成,而且留下许多影响至今的矛盾。

①刘中民:《巴以冲突模式骤变震惊世界》,《世界知识》2023年第21期。

②刘中民:《中东:转型与冲突相互激荡》,《光明日报》2023年12月25日。

③即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与麦加哈希姆家族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之间的通信,双方通信的具体情况可参见:Arthur Goldschmidt Jr., Lawrence David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inth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10, pp.204-206.

④William L. Cleveland, Martin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pp.162-163.

⑤William L. Cleveland, Martin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p.164.

⑥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eds., *The Israel-Arab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sixth edition, New York: 2001, p. 16.

(二)一战后英国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失败,后者局势日趋失控,英国最终把巴勒斯坦问题移交联合国,联合国在美国主导下于1947年通过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案,巴以问题由此产生并延续

1920年,英国任命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为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英国对巴勒斯坦正式实行委任统治。20世纪20~30年代,在英国贝尔福宣言的鼓舞下,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发起了数次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浪潮,并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行政机构和准军事组织。伴随犹太人人口的不断增加,阿拉伯民族与犹太人的冲突不断发生,直至爆发1936~1939年巴勒斯坦人大起义。1937年英国成立皮尔委员会,计划把巴勒斯坦分割为犹太国和巴勒斯坦国,耶路撒冷归英国委任统治。1939年英国发表白皮书,计划把以后五年内犹太移民的数量限定为7.5万人,十年内使巴勒斯坦独立。英国的政策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反对,犹太武装团伙对巴勒斯坦人和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发起恐怖袭击,英国的委任统治逐步失控,并在二战后决定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①。

在英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大会成立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P),负责调查巴勒斯坦的情况。经过调查,该委员会一致建议终止英国的委任统治并给予巴勒斯坦独立。委员会内少数派的报告呼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联邦国家,多数派的报告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美国总统杜鲁门完全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决心通过多数派的报告,并为此发起了广泛的游说活动。在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33票(包括苏联)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巴以分治方案,即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但占人口总数不到1/3的犹太人获得处于沿海平原地区的57%巴勒斯坦土地,计1.4万多平方公里;占人口2/3以上的阿拉伯人获得多处于贫瘠沙漠地区的43%土地,计

1.1万多平方公里^②。

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实质上严重不合理的巴以分治方案,直接导致了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以及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建立犹太国家的绝对支持是巴以分治方案得以通过的根本原因。这正如一学者所言:“无论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取得的成就如何,但它在联合国的胜利基本上是在美国赢得的。”^③

二、冷战前期(1948~1979):四次中东战争与阿以冲突的发展变化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大阵营在中东的对抗、四次中东战争、埃及与以色列建交都是导致巴以问题复杂化的重要因素。

(一)在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在中东的体现是美苏两大阵营对中东的争夺,并构成影响巴以冲突的国际体系根源

美国阵营主要是“北层国家”伊朗和土耳其以及亲西方的君主制国家沙特等,并组建了“巴格达条约组织”;苏联阵营主要是南方的阿拉伯国家,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当然有些国家在阵营选择上前后有所变化,如1958年革命前的伊拉克追随美国,后受苏联影响大;埃及先亲苏后亲美。阿以冲突尤其是四次中东战争都深受这种体制制约,其突出表现是美国和西方阵营支持以色列,苏联阵营支持阿拉伯国家,但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程度远不如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其逻辑是“美国的冷战心态把一个强大的以色列视为苏联在中东推行扩张主义的障碍”,“而叙利亚和伊拉克则服从埃及的领导与苏联建立军事伙伴关系”。^④在这种背景下,阿以冲突不仅深受美苏冷战的影响,而且成为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国家在阵营选择方面的变化也对阿以冲突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突出表现是萨达特于1970年执政后埃及转向亲西方,并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确立对以色列的谈判资本后,在美国的调解下选择与以色列谈判和和解,进而导致阿拉伯世界发生严重分裂,也削

^①关于这一时期的详细情况参见 William L. Cleveland, Martin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pp.244-263.

^②解力夫:《中东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③Charles D.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2001, p. 195.

^④William L. Cleveland, Martin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pp.354-355.

弱了阿拉伯国家联合对抗以色列的力量。

(二)在中东地区格局中,这一时期的四次中东战争以及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揭开了阿以冲突向巴以冲突转变的序幕

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当时在阿拉伯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而埃及则是领导阿拉伯统一运动的中心^①。阿拉伯民族主义构成了1948、1956、1967年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的思想武器,期间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在1958~1961年期间实现短暂统一是埃及领导阿拉伯统一运动达到的高潮,但又昙花一现般宣告失败^②。中东地区格局的最大变化源于1967年战争,阿拉伯国家战败,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耶路撒冷,导致领导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一蹶不振^③。1967年和1973年两次中东战争后,联合国通过第242号和338号决议,其核心是以色列退出1967年战争占领的领土,以色列的生存得到保障^④,这两个决议成为解决巴以问题的基础性文件。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在美国的斡旋下,埃及和以色列进行外交接触。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在华盛顿签署埃以媾和的戴维营协议,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建交。埃及1979年和以色列单独媾和是阿以冲突逐步向巴以冲突转变的开始。埃及与以色列媾和还导致阿拉伯世界发生严重分裂,埃及因此被开除出阿盟。

(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立及其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成为巴勒斯坦问题复杂化的新因素

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赞助下于开罗成立,并深受埃及的限制。但“1967年阿拉伯人的失败是一种催化剂,促使巴解组织从一个来自开罗的官僚贵族团体转变为一个独立的抵抗组织,致力于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⑤。值得注意的是,由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于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法塔赫(al-Fatah)组织

开始崭露头角,该组织于1967年将活动中心转移到约旦并取得迅速发展,1969年,阿拉法特被选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直到2004年去世他一直担任该职务。

法塔赫奉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恢复巴勒斯坦家园的基本目标,“通过这种方式,法塔赫/巴解组织领导人在阿以冲突中成功地恢复了巴勒斯坦的维度并建立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身份。”^⑥但是,伴随巴解组织力量增强,其与约旦王室政权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约旦把巴解组织驱逐出约旦的“黑九月事件”,巴解组织被迫转移至黎巴嫩^⑦。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巴解组织与约旦矛盾的公开化,而且使转移至黎巴嫩(后来又转移到非洲)的巴解组织远离了本土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斗争。

三、冷战中后期(1979~1990):国际和地区格局剧烈变动与巴以问题的复杂化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国际格局与中东地区格局均发生深刻变化。在国际格局层面,1979年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对美国 and 苏联的全球战略和中东战略产生深刻影响,海湾地区 and 阿富汗事务在美苏中东战略中的地位急剧上升。在地区格局层面,阿拉伯国家将地区事务的重心转向应对黎巴嫩内战、阿富汗战争、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等重大问题,阿拉伯世界因两伊战争发生分化,不仅导致巴以问题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地位明显下降,而且进一步削弱了阿拉伯国家联合对抗以色列的力量。而伊朗自1979年革命后持强烈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和政策,进而使伊朗对巴以冲突的影响上升。在地区国家发生分化的同时,巴勒斯坦内部的分化也迅速加剧,成立于1987年的哈马斯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意识形态、政治目标和斗争方式上均存在深刻的矛盾。以下选择若干主要问题加以分析。

(一)阿拉伯世界因地区形势变化发生进一

①刘中民:《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89-92页。

②William L. Cleveland, Martin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p.314.

③刘中民:《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15页。

④解力夫:《中东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⑤William L. Cleveland, Martin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p.359.

⑥William L. Cleveland, Martin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p.359.

⑦William L. Cleveland, Martin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pp.362-363.

步分化

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输出革命”构成伊朗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而海湾国家成为伊朗“输出革命”的首要对象,这是导致沙特等海湾国家对抗伊朗的根源之一,也是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的诱因^①。但是,身为阿拉伯国家的叙利亚却在两伊战争中支持波斯民族的伊朗,反对同为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②,并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上全力支持伊朗,削弱伊拉克。叙利亚选择反对伊拉克,这背后与两国长期争夺泛阿拉伯主义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权、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以及幼发拉底河河水分配之争相关;而叙利亚和伊朗共同反对以色列、同为什叶派的亲缘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利益考虑,促使叙利亚选择支持伊朗^③。此外,阿拉伯国家围绕黎巴嫩内战中的宗派矛盾,也是导致阿拉伯国家分化的重要原因。

(二) 伊朗对巴以冲突的影响上升

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和以色列同为美国的盟友并在政治、安全、军事和经贸领域保持了密切的合作。但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把反对美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以色列作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基本意识形态,导致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但双方仍由于共同仇视伊拉克而在两伊战争中进行了一定的合作^④。由于伊朗在黎巴嫩支持反以色列的真主党,为真主党等什叶派组织提供训练、物资以及经费等方面的支持^⑤,并为巴勒斯坦哈马斯提供支持,使伊朗对巴以冲突的影响上升,并使巴以冲突中增添了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伊朗三方之间的复杂矛盾。

(三) 巴勒斯坦内部分化为哈马斯和巴解组织两大力量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前,巴勒斯坦的反以斗争主要是在世俗民族主义力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伴随着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惨败和伊斯兰复兴运动

的兴起,以哈马斯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组织迅速崛起。

哈马斯与巴解组织围绕巴勒斯坦建国方案、以色列的合法性、巴以和平进程等问题均存在严重矛盾分歧。在建国方案上巴解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世俗的巴勒斯坦民族国家,哈马斯组织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在对待以色列合法性问题上,巴解组织从最初拒不承认以色列转向了承认以色列,但哈马斯一直拒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在巴以和平进程问题上,巴解组织选择了和平谈判的道路,哈马斯则号召对以色列发动“圣战”,坚持以武装斗争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反对任何一项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提议、方案和国际会议^⑥。因此,巴勒斯坦内部世俗民族主义力量和伊斯兰主义力量两大阵营的严重分裂,对后来的巴以关系和中东和平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冷战后中东和平进程进展及其受挫 (1991~2001)

从1990年海湾危机到2001年“9·11”事件期间,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胜利使美国的中东霸权得以确立,中东和平进程一度在美国的主导下取得重大进展。但1995年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后,以色列右翼势力利库德集团迅速崛起,巴勒斯坦内部哈马斯和巴解组织矛盾加剧,导致中东和平进程发生严重倒退。此外,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后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使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团结合作受到严重冲击,导致阿以冲突进一步向巴以冲突转化。

(一) 美国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

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后美国独霸中东,美国依靠“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政策主导中东事务。在海湾战争之后,布什政府开始了广泛的努力,以实现解决阿以冲突。1991年10月30日,关于中东和平的马德里和会召开,尽管“马德里会议更多是关

① 赵伟明:《两伊战争的历史渊源及阿拉伯河争端》,《西南亚研究》1989年第2期。

② Ibrahim A. Karawan, “Arab Dilemmas in the 1990s: Breaking Taboos and Search for Signpost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48, No.3, 1994, p. 454.

③ 详细论述参见何志龙、张妮:《叙利亚与两伊战争》,《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

④ 详细论述参见何志龙:《20世纪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评析》,《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

⑤ 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7页。

⑥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巴勒斯坦内部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矛盾纷争》,《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

于公开的姿态,而不是实质性的讨论”,但马德里会议的意义不容忽视,“这是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接触推向新水平的重要一步。它第一次召集了来自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尚未承认以色列生存权的邻国阿拉伯国家——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代表,一起讨论和平问题。”^①

从1991年底至1993年春,阿拉伯和以色列代表团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举行数次会晤,讨论的重点都是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定居点问题。1993年春夏,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在挪威奥斯陆进行秘密谈判,经过艰苦谈判,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不仅实现了相互承认,而且就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自治达成了一致,但耶路撒冷问题、犹太定居点问题、难民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93年9月13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主持下,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于华盛顿签署《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似乎通过直接谈判向和平共处迈出了重要一步”。根据《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直接控制占西岸3%的A区;巴民族权力机构与以色列共同控制占西岸24%的B区;以色列将保留对C区的完全控制,该地区占约旦河西岸的74%,还包括该地区所有的145个定居点^②。1994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城市实现自治,法塔赫成为自治政府的执政党。但是,巴勒斯坦主权深受以色列控制,以及其他问题的悬而未决,都为后来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和巴以冲突再起埋下了根源。

(二)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使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阿以冲突逐渐向巴以冲突转化

在海湾危机中,阿拉伯国家分裂成反对伊拉克和支持、同情伊拉克的两大阵营,进而使阿拉伯世界继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媾和,两伊战争中叙利亚支持伊朗后又一次发生严重分裂。此外,海湾战争使伊拉克的军事实力遭到重创,使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的“抵抗阵营”国家的实力在失去埃及后再度遭到沉重打击,叙利亚、黎

巴嫩、约旦三国的力量难以对以色列构成威胁。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约旦与以色列于1994年建交,阿拉伯国家“抵抗阵营”已濒于瓦解。更为严重的是,在海湾危机中,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错误地选择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不仅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而且失去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③。总之,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抵抗阵营”力量遭到严重削弱,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支持下降,都是阿以冲突进一步向巴以冲突转变的重要原因。

(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色列右翼势力崛起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反对中东和平进程,导致这一进程陷入停滞

在以色列方面,自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后,以色列右翼势力的崛起使中东和平进程面临严峻挑战。其中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重大破坏作用的事件包括:1994年2月,犹太极端分子制造残杀巴勒斯坦人的“希伯伦惨案”;1995年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2000年9月,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持续近四年之久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在此过程中,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极右翼力量的崛起以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逆转,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作为保守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内塔尼亚胡组建了“以色列历史上最保守、以宗教为导向的政府之一”^④,“由于内塔尼亚胡需要调和其联合政府所依赖的宗教激进和民族主义分子,因此他对被占领土采取了强硬的政策。”^⑤内塔尼亚胡的政策主要包括:强调安全第一的对外政策;反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反对阿拉伯难民返回家园;为犹太人定居点的存在和安全承担责任;维护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主权”;根据需要在任何地点使用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部队打击恐怖活动;以色列对耶路撒冷拥有绝对主权^⑥。

①William L. Cleveland, Martin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p.500.

②William L. Cleveland, Martin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p.504, p.506.

③王京烈:《阿以冲突前景分析》,《西亚非洲》1991年第6期。

④Baruch Kimmerling, “On Elections in Israel,” *Middle East Report*, vol. 26, No.4, 1996, p. 18.

⑤William L. Cleveland, Martin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p.504, p.510.

⑥《内塔尼亚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C%E9%9B%85%E6%98%8EC2%B7%E5%86%85%E5%A1%94%E5%B0%BC%E4%BA%9A%E8%83%A1/3640612?fr=ge_ala. (2023-12-02)

据此,以色列大规模推进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加强对耶路撒冷的实际控制,拒绝执行《奥斯陆原则宣言》关于从巴勒斯坦撤军的协定,都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在巴勒斯坦方面,随着巴以和谈的启动,哈马斯与巴解组织矛盾不断加剧,并从事暴力活动、反对巴以和谈。“哈马斯对整个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拒绝表现在针对以色列大城市平民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上”^①。1994年2月,犹太极端分子残杀巴勒斯坦人的“希伯伦惨案”发生后,哈马斯向以色列全面宣战,哈马斯与巴解组织矛盾也进一步激化。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爆发后,由于哈马斯不断制造自杀性袭击事件,以方加大了对巴激进派别的打击力度,频繁实施“定点清除”行动,巴以关系进入持续至今的恶性循环^②。

五、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和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时期(2001~2023)

从“9·11”事件爆发到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国际格局、地区格局和巴以问题本身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国际格局和地区格局的变化是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的外部因素,而巴以双方关系以及各自内部的变化,特别是以色列右翼化日趋严重,巴勒斯坦内部矛盾加剧,则构成了巴勒斯坦问题更加复杂,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根源。

(一)在国际格局方面,美国中东战略议题不断变化并转向战略收缩,导致巴以问题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下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片面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严重破坏了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反恐与民主改造中东构成美国中东战略的两大目标,进而导致巴以和平进程日趋边缘化^③;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中东政策更是“一直被伊拉克问题所主导”,而“巴

勒斯坦问题被严重忽视”^④。直到小布什任期即将结束,美国才于2007年下半年召开安那波利斯中东和平会议,但未取得任何成果。在奥巴马时期,缓和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关系,放弃反恐战争政策并把反恐重心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中东民主化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⑤,推动伊核问题谈判构成了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内容。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也恰逢巴以之间爆发新世纪第一次大规模加沙冲突之际,此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逐步转向亚太再平衡,中东政策主要以推动伊核谈判为主;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中东相继爆发“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伊斯兰国”异军突起等重大事态,使美国政府始终面临中东地区格局剧变与中东战略收缩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已无力顾及巴以和平进程,2013~2014年美国推动巴以双方举行的华盛顿和平谈判均无果而终,伊核协议成为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唯一遗产。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在继续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遏制伊朗整合在奥巴马时期日渐疏远的盟友关系,重点强化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领域承担更多任务和成本,进而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⑥。特朗普的巴以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历史倒退,其突出表现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了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企图强推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⑦,其中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承认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的主权;建立一个解除武装、没有军队,即主权不完整的巴勒斯坦国,这完全颠覆了巴以和谈的基础。由于它严重背离国际法原则、联合国决议精神、国际社会公平、公正和持久解决巴以冲突及中东争端的广泛共识,因此它注定是一

①William L. Cleveland, Martin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p.504, p.508.

②刘中民:《巴勒斯坦内部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矛盾纷争》,《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

③陶文钊:《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研究》,《美国研究》2008年第4期。

④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S. Indyk, eds, *Restoring the Balance: A Middle East Strategy for the Next President*,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1, p.4.

⑤详细论述参见刘中民:《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政策述评》,《国际观察》2013年第4期。

⑥刘中民:《中东的2018:对抗、僵持、失衡》,《光明日报》2018年12月16日。

⑦关于“世纪协议”的内容可详见:“Peace to Prosperity: A Vision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People”, <https://www.whitehouse.gov/peacetoprospersity>. (2023-12-02)

很难被巴勒斯坦接受的单边和强制交易^①。

为配合所谓的“世纪协议”，美国还极力推动以色列与“温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并使阿联酋、巴林于2020年与以色列签署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阿拉伯世界在巴以问题上联合的能力和意愿因此遭到严重削弱。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除继续减少对中东的战略投入相对明确外，并无宏大的中东战略，其中东政策主要包括为减少中东对美战略掣肘而进行政策调整^②。除了重提“两国方案”外，拜登政府在巴以问题的政策与特朗普政府并无明显区别，并且继续推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并在2021年推动摩洛哥、苏丹与以色列建交。

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先后经历了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四任政府，其在中东的地位经历了从霸权巅峰到逐步衰落的变化，这也与美国中东战略从强势扩张转向战略收缩存在一定关系。美国在此过程中面对的新议题、新挑战不断增多，以及美国转向战略收缩，中东政策更加狭隘、功利和缺乏公正性，导致美国对巴以问题的政策既缺乏足够的动力，也失去了应有的公正，这是导致巴以问题不断被边缘化的国际体系根源。

(二)中东地区格局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地区议题的多样化使巴以问题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地位下降，矛盾的复杂化使地区国家难以在巴以问题上形成合力

在地区议题方面，“9·11”事件以来中东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层出不穷的地区议题和热点问题，并在客观上削弱了巴以问题在中东事务中的地位，其中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阿拉伯之春”等重大问题对巴以问题的冲击尤为严重。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战争、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伊朗核危机、“阿拉伯之春”导致部分阿拉伯国家发生政权更迭、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危机、“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猖獗、难民问题严重等一系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议题层出不穷，使得多样化的地区议题的交互影响、

相互叠加，且不断变换，使地区国家既承受着来自美国和西方反恐战争、政权更迭、民主改造等深刻的外部压力，同时也承受着民众抗议浪潮冲击政权安全、经济发展乏力、族群和教派冲突严重、极端恐怖力量猖獗等内部压力。中东地区议题的多样化、复杂化不仅使巴以问题在地区事务中重要性遭到冲击和稀释，而且极大地分散了地区国家对巴以问题的关注，这些因素与美国巴以政策日趋消极、巴以双方及各自内部矛盾复杂化交互作用，共同导致了巴以问题的边缘化。

在地区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的矛盾方面，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矛盾加剧和阵营分化，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缓和，也是影响巴以问题边缘化的重要因素。

首先，沙特与伊朗的阵营化对抗。沙特和伊朗的阵营化对抗构成了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格局的重要特点^③，双方的主要矛盾包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进入新世纪以来，双方围绕中东地区事务的矛盾与民族矛盾、教派矛盾叠加，进而导致双方于2016年断交，双方的对抗呈现出阵营化、教派化、代理人化的特征^④，并在一系列热点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代理人竞争^⑤。沙特与伊朗的对抗还对阿拉伯世界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团结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沙特认为卡塔尔与伊朗关系暧昧。沙特与伊朗的关系自2021年以来才有所缓和，直到2023年才实现复交。从某种程度上说，沙特与伊朗的长期对抗为美国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提供了机会。

其次，土耳其和沙特领导的“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和“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的矛盾。双方的矛盾始于围绕埃及穆兄会的争夺。在2012~2014年穆兄会在埃及短暂执政到塞西领导军方废黜穆兄会的过程中，土耳其、卡塔尔支持穆兄会，而沙特、阿联酋则反对穆兄会，并成为影响2017年卡塔尔断交危机的重要因素。卡塔尔追随土耳其支持穆兄会，成为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并

①马晓霖：《美国解决巴以冲突的新方案：基于“世纪协议”的文本解读》，《西亚非洲》2020年第3期。

②董漫远：《拜登政府中东政策调整与中东形势新特征》，《当代世界》2022年第5期。

③Shaul Bakhash, *Reign of Ayatollah: Iran and the Islamic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84, p.232.

④刘中民：《中东地区格局的冷战化趋势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8年第2期。

⑤陈翔、申亚娟：《伊朗介入中东地区事务的动力及限度》，《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1期。

对其进行制裁的重要原因^①。此外,双方围绕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热点问题话语权等问题也存在尖锐矛盾,双方的矛盾直到2021年以来才得以缓和改善。

再次,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加快。2000年以来,中东和平进程受阻,巴勒斯坦问题不断被边缘化,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集体合作的下降,为美国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并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2020年9月15日,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巴林四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2021年摩洛哥、苏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2022年3月,以色列首次作为东道主邀请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埃及四个阿拉伯国家外长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六方决定成立“内盖夫论坛”,致力于推动务实合作。^②2022年以来,以色列高层领导人还频繁造访阿联酋、阿曼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深受美国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加剧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

最后,伊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与以色列的矛盾上升,并通过为巴勒斯坦问题代言谋求地区话语权。1979年以来,伊朗一直通过反对以色列争取道义制高点,并通过支持巴勒斯坦激进力量哈马斯谋求在巴以问题上的话语权,导致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不断加剧。2002年土耳其正义发展党执政以来,其外交向中东地区回归,并以支持巴勒斯坦谋求地区热点问题的话语权,导致土耳其与以色列龃龉不断。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走近,且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对抗加剧、与土耳其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伊朗、土耳其两个非阿拉伯大国不断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谋求地区话语权^③。

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

以来,相对于过去阿以矛盾是中东地区的矛盾主线,中东地区国家的矛盾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态势,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分化,都不利于地区国家在巴以问题上形成共识和团结合作,甚至出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走近的重大变化。

(三)从巴以关系看,以色列右翼化日趋严重,巴勒斯坦内部矛盾加剧,哈马斯与以色列对抗加剧,都构成了巴以矛盾尖锐化、复杂化,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根源

从以色列方面看,以色列右翼化日趋严重,特别是内塔尼亚政府在巴以问题奉行保守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④,对巴勒斯坦执行强硬的政策,是造成巴以矛盾不断加剧,巴以冲突周期性爆发的重要根源。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于20世纪20年代由泽耶夫·亚博廷斯基创立,并在当代被梅纳赫姆·贝京、伊扎克·沙米尔、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领导人继承,其共同特点是强调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历史权利”的绝对性,否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及其建国的合法性,并崇尚实力优先的强权哲学。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是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领土、耶路撒冷、犹太定居点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否定“两国方案”的思想根源。内塔尼亚胡强调要把以色列建设成“犹太民族国家”,致力于实现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建立“大以色列”的目标;坚持以军事实力促和平的观念,反对“土地换和平”;坚持把“反恐”与巴勒斯坦问题联系在一起,把巴勒斯坦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以反恐为名对哈马斯领导进行“定点清除”^⑤。在这些政策的支配下,以色列在领土问题、难民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犹太定居点问题上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也正是在2009年内塔尼亚胡长期任以色列总理以来,巴以关系发生了严重倒退,巴以和谈的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陷入周期性冲突,直至2023年10月

^①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

^②参见《以色列内阁批准成立“内盖夫论坛”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合作》, [https:// world.gmw.cn/2022-09/19/content_36033599.htm](https://world.gmw.cn/2022-09/19/content_36033599.htm)。(2023-12-02)

^③参见刘中民、赵跃晨:《从相对疏离到权力角逐——土耳其与沙特争夺地区领导权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8期。

^④刘中民、王利莘:《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源流及嬗变》,《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

^⑤刘中民、王利莘:《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源流及嬗变》,《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

以来爆发新一轮巴以冲突。

在巴勒斯坦方面,其突出的问题是内部矛盾更加突出,哈马斯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之间的对抗造成巴勒斯坦内部严重分裂,而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恶性循环的冲突,使中东和平进程遭到严重破坏并陷入停滞。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持续近四年之久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据统计,仅2000~2003年,由哈马斯等巴激进组织策划制造的自杀性袭击事件多达100多起。与此同时,以方也加大了对巴激进派别的打击力度,频繁实施“定点清除”行动。2004年3月22日和4月17日,哈马斯领导人亚辛及其继任者兰提西相继在加沙地带被以军“定点清除”;2004年11月11日,巴解组织的核心领导人阿拉法特逝世,哈马斯和巴解组织均遭遇严重挫折。

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后和2005年以色列军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后,巴解组织与哈马斯的分裂不断加剧:2006年1月,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第二届立法会选举胜利,引发巴勒斯坦政坛地震;2006年3月哈马斯单独组建自治政府;2006年6月,哈马斯宣布不再执行巴以停火协议,以色列借机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丧生;2007年3月,巴民族联合政府成立,但是两派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解决,双方的暴力冲突反而愈演愈烈。2007年6月,哈马斯从法塔赫手中武力夺取了加沙控制权。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解散哈马斯领导的联合政府,同时组建新的联合政府;哈马斯拒绝承认阿巴斯的主席令,坚持其政府的合法性。巴勒斯坦陷入了约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加沙由哈马斯控制的严重分裂,双方的尖锐矛盾构成了巴以和谈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2009年以来,法塔赫与哈马斯进行了多次谈判,其议题主要包括组建和解政府,重新分配权力和制定选举方案,改组和整合巴武装力量及安全机构等^②,双方也曾曾在沙特、埃及等国家的斡旋下达成和解,但却从未得到真正执行,进而使巴

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分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分裂局面延续至今。

伴随巴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的分裂,以及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成为巴以冲突的主要方式,巴以冲突的新模式已经形成,其基本逻辑是以色列在定居点、耶路撒冷等问题上采取激进政策,哈马斯通过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等方式进行报复,引发以色列对加沙进行空袭等军事行动。2008年、2012年、2014年、2019年、2021年数次程度不等的加沙冲突都具有这种特征,直至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以多种方式对以色列进行袭击,造成以色列1200余人伤亡,进而引发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大规模空袭和地面行动。由此可见,新一轮巴以冲突是长期以来矛盾累积的产物,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以暴制暴恶性循环的结果。

六、余论:新一轮巴以冲突的严重消极影响^③

2023年10月7日,巴以之间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此次巴以冲突在冲突方式、伤亡规模、危机程度等方面均打破了巴以关系的僵持模式,并使国际社会在如何停止暴力、结束冲突、重启和平进程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新一轮巴以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边缘化,其中既有巴以双方及各自内部的复杂矛盾,也与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忽视乃至背离“两国方案”,通过所谓《亚伯拉罕协议》片面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密切相关。异常惨烈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三个月有余,并对巴以双方、地区形势乃至国际体系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尽管巴以冲突十分惨烈并有所外溢,但由此引发第六次中东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中东地区的和解潮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并不会因巴以冲突的影响而破裂。

首先,巴以双方都是冲突的输家。巴以在本轮冲突中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双方不仅无法达到既定目标,相反还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巴勒斯坦方面,哈马斯在战争中遭到重创,其对加沙的实际统治很可能因本轮冲突而终结。目

^①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巴勒斯坦内部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矛盾纷争》,《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

^② 马晓霖:《前景堪忧的巴勒斯坦内部和解》,《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3期。

^③ 本部分内容综合了笔者以下几篇评论的内容:《巴以冲突模式骤变震惊世界》,《世界知识》2023年第21期;《巴以冲突产生多重消极影响》,《解放日报》2023年10月29日;《中东:转型与冲突相互激荡》,《光明日报》2023年12月25日。

前,加沙地带已有超过2.5万巴勒斯坦人付出生命代价,超过190万加沙民众流离失所、生活无助,包括社区、医院、学校在内的加沙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加沙陷入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在以色列方面, Hamas对以色列进行袭击并造成1200多名平民伤亡,以色列情报、安全、国防部门的系统性失灵,不仅打破了以色列的安全神话,也证明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失败。以色列既无法通过战争实现解救人质、消灭Hamas的目标,还遭遇了国内经济损失惨重、政治危机不断加剧,以及在国际社会陷入严重孤立的困境,在加沙政治安排方面也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此轮大规模冲突必将进一步加深双方的仇恨心理,并使短期内重启对话谈判更加困难,国际社会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将更加艰巨。

其次,本轮巴以冲突尽管不会导致地区性战争,但是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在军事和安全层面,巴以冲突的外溢突出表现为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等什叶派政治力量对巴以冲突的介入和参与。一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其最有可能延续甚至升级,但升级为大规模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不大。二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与美国的冲突,其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主要表现为美国和以色列出于威慑目的对叙利亚进行空袭,以及什叶派民兵武装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方式进行报复。三是也门胡塞武装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也门胡塞武装以发射导弹及无人机的方式对红海附近的以色列和美国目标发动袭击,伴随美国组建护航联盟并对也门本土的胡塞武装目标进行打击,红海危机不断升级。在政

治层面,巴以冲突的外溢主要表现为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上升,但除伊朗与以色列长期对抗外,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不会走向彻底破裂,而伊朗尽管不大可能直接参与巴以冲突,但其与以色列、美国对抗在不断加剧,冲突的风险不断上升。总之,巴以冲突外溢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不致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

最后,本轮巴以冲突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第一,联合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准则遭到严重破坏。在本轮巴以冲突中,由于以色列一意孤行,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阻挠,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美国多次否决旨在缓解和结束巴以冲突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使安理会难以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此外,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中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也使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遭到严重破坏。第二,全球范围内的族群和宗教矛盾更加突出,全球安全风险上升。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反犹活动和“伊斯兰恐惧症”同时有所抬头,针对犹太人、穆斯林的暴力和犯罪活动增加。此外,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社会内部因巴以冲突导致撕裂加剧,政治动荡和安全风险加剧,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大。

实践证明,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只有其得到全面公正的解决,中东地区才有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责任编辑 吴爱军]